



《晏子春秋》研究史

A History of Research on *Yanzi Chunqiu*

刘文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晏子春秋》研究史

A History of Research on *Yanzi Chunqiu*

刘文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晏子春秋》研究史/刘文斌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2-010408-6

I. ①晏… II. ①刘… III. ①先秦哲学②《晏子春秋》—研究—历史—中国
IV.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1364 号

责任编辑 李 俊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8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5 插页 2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08-6

定 价 6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式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谭家健

《晏子春秋》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的传记资料汇编。晏婴曾辅佐齐景公等三代国君，立朝数十年，是与管仲齐名的杰出政治活动家、道德高尚的贤者，在先秦以及后世享有崇高的声誉。《晏子春秋》共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全部与晏子有关。或为短小故事、传说，或为君臣问对，或与多人议论，具有不同程度的历史真实性和一定的文学形象性、趣味性。是我国第一部以一个人为中心的传记文学作品。

关于《晏子春秋》的研究，清以前学人关注者不多。其成书时代和作者，或以为战国齐人，或以为秦末汉初某人，甚至有人怀疑是六朝伪书。其学术体系，或归入子部儒家、或墨家、或杂家，或列在史部。清中期以后，学者们对该书的文字校勘、音义训释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上世纪七十年代，山东临沂西汉初年墓中出土大批《晏子》竹简，内容与今本大致相合。于是成书于先秦遂成定论，对该书的诸多问题从各方面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逐渐增多，终于改变了长期冷落的局面。

刘文斌教授的《晏子春秋研究史》是第一部对该书产生二千多年来的编辑、整理、考定、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全面梳理的学术史。对西汉以来《晏子春秋》研究的大致历程、主要成果、各种学术问题和重要见解，做出尽可能科学的、中肯的评述与阐释，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为今后继续研究提供学术积累和经验教训，并汇集了大量资料以备参考。对于《晏子春秋》的研究来说，无疑是带有总结性的学术专著。

我粗读书稿之后，有三点突出印象：

第一点是内容充实、系统。

导论之后，第一章是清以前的研究。以刘向编辑《晏子春秋》和柳宗元《辩晏子春秋》为重点。这两位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书稿给刘、柳以充分

的评价。宋明时期,刘先生引述了晁公武、项安世、程大昌、王应麟、宋濂、焦竑、胡应麟、王鏊等人的意见,多为片断、零散的文字,吉光片羽,一般人并不了解,书稿下了一番爬梳发掘的功夫。

第二章,清代的研究。重点介绍了孙星衍、卢文弨、洪颐煊、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苏时学、黄以周、文廷式、陶鸿庆、于鬯、苏舆等人的校释成果,同时介绍了吴德旋、管同的六朝伪书说,恽敬、凌扬藻对《晏子春秋》内容的理解,还介绍了一些人对晏婴政治活动和其他表现的不同评价,如马骕、赵青藜、姚鼐、马国翰等,还引用了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的意见。虽然是讨论历史人物,而其行事在《晏子春秋》中亦是重要情节,评其人与评其书是一回事,对于研究《晏子春秋》很有意义。

第三章,民国时期的研究。首先介绍“蛤笑”的《晏子春秋学案》,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解读《晏子春秋》,认为其中“有与君主立宪之义相符合者”,未免牵强,却是一股新风。还有梁启超、尹桐阳肯定该书不伪,钱穆、黄云眉重申伪书说,刘师培、张纯一、于省吾等继续对该书进行校释,他们的成就超越前人。

第四章,1949—1976 年间的研究。校释成果有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论文只有高亨、董治安师生的两三篇。

第五章是 1976—2010 年间的研究。列举的文章和著作相当多,但介绍有所侧重。

第六章,台港之研究,介绍王更生、陈瑞庚、郑良树等人的论著。

从上述简介可以看出,书稿规模宏大,涉及面相当广泛。

第二点印象是评论周详细致。

对许多学者成果的评论,既讲贡献,也讲缺失和错误,如对孙星衍,刘著推崇备至,又指出,音韵注释存在不少问题,少数语词解读有误,某些关键词漏注,个别语词解释迂曲。对卢文弨、洪颐煊、孙诒让、刘师培等人的失误,亦多有匡补。每章之末有小结,总论该时期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有相当概括性和理论深度。面对当代各种不同学术见解,书稿随时提出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即使观点大致相近而表述语言不一致,刘先生也力求精确,不随意苟同。他这部学术史,绝不是纯客观地罗列介绍,而是处处渗透他本人的研究心得和独立判断。在某些方面他比古人站得更高,(例如他可以利用最新出土材料纠正古人的校勘)比当代某些人看得更广,(他熟悉某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不会炒冷饭)他与古人对话与今人讨论,态度都是相当认真挚着的。

余论《晏子春秋》研究的成就与反思,总结相当精辟。成就概括为六点:一、文本校释取得巨大成绩,二、对作者和成书时代进行了深入的考辨,三、对著作性质形成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四、对晏子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五、对《晏子春秋》语言的特点有所归纳,六、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运用了考古资料,吸纳了西方某些文艺理论观点。反思几个问题很有启发性:一、《晏子春秋》中的晏子与历史人物不能等同,二、该书中的材料不能都当成信史,三、该书的作者不可能坐实为某一个人,四、书中反映的语言特点不宜局限于某一地区,五、不能为了突出某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而过高地放大晏子的思想水平。刘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在其他学术研究中也不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具有普遍意义。

第三,材料相当丰富。

此书有三个附录,一是历代版本及笺校书目,收录中国书目 119 种,日本书目 29 种;二是研究论文索引,中国大陆 306 篇,台港及海外 26 篇;三是重要研究资料选编,并附有按内容分类检索表。三种附录合起来占全书相当大的篇幅。据我所知,刘先生为收集这些资料下过很大功夫,到访过全国许多图书馆,征求过多位有关专家的意见,还写信求助于台湾学者,有些资料来之不易。即使用电脑从互联网上检索,也是很难达到他这种程度的。

当然,作为第一部研究史,既是开创,必有遗漏。据我所见,明代对《晏子春秋》的选评之书,尚可补充:如焦竑选、陈懿典评的《诸子折衷汇锦》中有《晏子》选评,陈仁锡《子品金函》中有《晏子春秋》选评。台湾近数十年出版了十余种关于《晏子春秋》的专著,刘先生自称只见过几种,有不少尚未亲见。附录中列举了 2010 年以前的报刊文章和硕博论文目录,却忽略了这个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散文史有关《晏子春秋》的专节,这些文学史的意见影响广泛,值得重视,对读者是有参考价值的。

刘先生对古人是敢于批评缺失的,然而对于今人似乎有些过于谨慎。小的问题可以批评讨论;遇到某些重大问题,似乎颇存顾虑。今人有所谓“新见”明显属于猜想,缺乏充分的理由和严密的论证。刘先生虽然也表示不赞成,却没有如同古人那样加以认真的反驳,反而称为“贡献”。既质疑其说不能成立,又怎么谈得上“贡献”呢?

祝刘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术研究中作出更大成绩。

2013 年 11 月 14 日

目 录

序	谭家健 1
引言 《晏子春秋》的研究价值和本书的写作目的	1
第一节 《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	1
第二节 《晏子春秋》在先秦散文中的地位	11
第三节 本书的价值及其写作目的	18
第一章 清代以前的《晏子春秋》研究	22
第一节 刘向首校《晏子春秋》	22
第二节 柳宗元所引发的有关争论	30
第三节 宋、明两代的《晏子春秋》研究	36
第四节 清代之前关于晏婴的记载与评述	39
第五节 结语	45
第二章 清代的《晏子春秋》研究	47
第一节 孙星衍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	47
第二节 卢文弨等人的《晏子春秋》校释	54
第三节 王念孙的《读晏子春秋杂志》	60
第四节 俞樾、孙诒让的《晏子春秋》校释	66
第五节 黄以周等人对《晏子春秋》校释的深化	71
第六节 对《晏子春秋》著作属性和产生时代的争论	84
第七节 关于晏婴政治活动的记述与评价	88
第八节 结语	93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晏子春秋》研究	95
第一节 梁启超等人的《晏子春秋》研究	95
第二节 刘师培的《晏子春秋》研究	100
第三节 张纯一、于省吾的《晏子春秋》校释	105

第四节 结语	112
第四章 1949 至 1976 年的《晏子春秋》研究	114
第一节 高亨、董治安的《晏子春秋》研究	114
第二节 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	119
第三节 结语	128
第五章 1976 至 2010 年的《晏子春秋》研究	130
第一节 谭家健、孙绿怡的《晏子春秋》研究	130
第二节 其他学者对《晏子春秋》著作性质、产生时代的研究	137
第三节 吕斌等人关于《晏子春秋》作者的研究	143
第四节 骈宇騫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	147
第五节 齐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晏子研究	153
第六节 姚振武等人关于《晏子春秋》语言的研究	158
第七节 关于晏子和《晏子春秋》的其它研究	163
第八节 文学史和散文史中关于《晏子春秋》的论述	168
第九节 高等院校硕士博士论文关于《晏子春秋》的研究	173
第十节 结语	186
第六章 台、港地区的《晏子春秋》研究	189
第一节 王更生的《晏子春秋》研究	190
第二节 陈瑞庚、郑良树的《晏子春秋》研究	195
第三节 结语	198
余论 《晏子春秋》研究的成就与反思	200
第一节 《晏子春秋》研究的成就	200
第二节 《晏子春秋》研究的反思	202
附录一：《晏子春秋》版本及笺校、研究书目	208
一、中国《晏子春秋》书目	208
二、日本《晏子春秋》书目	224
三、法、德《晏子春秋》书目	226
附录二：《晏子春秋》研究论文索引	228
一、中国大陆部分	228
二、台、港及海外部分	245
附录三：《晏子春秋》研究资料选编	248
一、《晏子春秋》佚文	248

二、关于晏婴家世、生平、遗迹的记载	250
三、有关晏婴的评论	286
四、有关《晏子春秋》著作性质的意见	295
五、关于《晏子春秋》著作真伪、成书时代和流传过程的意见	349
六、历代校刻《晏子春秋》序跋	392
七、《晏子春秋》版本题识	401
八、《晏子春秋》重言重意篇目	405
后记	411

引言 《晏子春秋》的研究价值和 本书的写作目的

第一节 《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

对于《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前人争议颇大。唐柳宗元之前,人们普遍将其视为儒家著作^①;柳宗元提出了墨家说^②;而清代《四库全书》则最先将其归入史部传记类^③。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其属于“记叙文学类”^④作品;但对于其具体的著作属性仍有不同的意见:董治安认为它是“一部接近历史小说的散文著作”^⑤,谭家健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集中刻划一位人物的传记性著作”,属“传记文学或历史故事一类”^⑥,孙绿怡则认为“《晏子春秋》既非编年纪事,又非语录体、问答体散文,而是一部记叙人物生平轶事及各种传说、趣闻、笑话的故事汇编——最早的人物传说故事集”^⑦。那么,应该如何判定《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呢?笔者认为,逐一分析《晏子春秋》的每一章材料,全面统计各类材料在著作中的比例,并努力深入到人们最初记录事件、传播人物轶事的动机,来判断作者使用这些材料编成著作的目的,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① 《史记·管晏列传》注引《正义》:“《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晏子》八篇”为儒书之首。《隋书·经籍志》亦同“汉志”,列《晏子春秋》于儒家。

② 见《辩晏子春秋》。《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114页。

③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上册,第514页。

④ 见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中华书局,1962年,第30页。

⑤ 见《说〈晏子春秋〉》。《山东大学学报》(语文),1959年第4期,第19—31页;后收入作者《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著作中。

⑥ 见《〈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17—27页。

⑦ 见《〈晏子春秋〉的文学价值》,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第65—69页。

《晏子春秋》并非子书,对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证据。首先,晏婴作为一位前诸子人物,其生年早于儒、墨等学派的创始人——他于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出任齐卿,这时儒家创始人孔丘还未出生,墨家创始人墨翟生年更晚八九十年,故将其归入后来产生的儒、墨等诸子学派的任何一家,其观点都难以成立。并且,晏子作为一位政治实践家,一生致力于处理齐国的现实具体政治问题,也并未如其他学者形成后来诸子学派的系统思想理论。

其次,即使不谈历史人物晏婴,而仅论反映其言行轶事的著作《晏子春秋》属于子书,其观点也难以成立。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晏子春秋》产生于战国时期,其时诸子学派已经产生,按说,根据著作体现的基本思想而将其归入某一家,问题应该不大;但从著作的实际出发,《晏子春秋》仍是难以归为子书的。因为大家知道,子书是要“论思想”的;而我们仔细审查《晏子春秋》就会发现,《晏子春秋》的主体不在“论思想”,其绝大部分篇幅在“记言行轶事”。笔者对此做过细致考查:《晏子春秋》全书共分《内篇》之《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和《外篇》第七、第八八篇内容。其中《内篇·谏上》共25章,以问对和劝谏形式阐发晏子思想(以下简称“论”)的至多不超过9章,而记述晏子言行轶事(以下简称“记”)的内容却不下16章;《内篇·谏下》共25章,“论”的内容至多不超过10章,而“记”的内容却不下15章。相比之下,《内篇·问》中“论”的内容最多:《问上》共30章,“论”的内容达到24章,而“记”的内容只有6章;《问下》共30章,“论”的内容达到27章,而“记”的内容只有3章。《内篇·杂上》共30章,“论”的内容不超过5章,而“记”的内容却不下25章;而《内篇·杂下》更是全部30章都为“记”的内容。《外篇第七》共27章,“论”的内容不超过11章,而“记”的内容却不下16章;《外篇第八》共18章,“论”的内容不超过4章,而“记”的内容却不下14章。总体统计下来,全书215章,其记述晏子劝谏景公、与记言体子书相近的内容不超过90章,仅占全部著作的大约五分之二篇幅;而更大量的内容却是记述晏婴的生活轶事,表现其道德修养、政事和外交中的卓越才干,体现其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内容。且即使从晏子与景公对话的所谓“论”的内容看,也只是涉及到他处理日常政务和规劝引导君王修身的见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一家思想,所以仍可以将它看作是记述晏子言行轶事中的“言”的内容,仍属于“记”的范围。所以,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考核,《晏子春秋》也很难归为子书,而应该是一部记述重要人物言行轶事,体现其历史作用的记叙类著作。

笔者又对《晏子春秋》全部材料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发现:《晏子春秋》材料并非出自于同一起来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应该出自于古史,表现在:记述笔法平实、古朴,无夸张、无虚构,多为晏子回答君王具体政治疑问的记录,内容较可信;文中经常出现古字、古意,内容往往涉及古齐地名,所记多与《左传》《孟子》等先秦可靠古籍相合者,如:

景公出游,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

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问也!闻天子之诸侯为巡狩,诸侯之天子为述职。故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夏谚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师行而粮食,贫苦不补,劳者不息。夫从南历时而不反谓之流,从下而不反谓之连,从兽而不归谓之荒,从乐而不归谓之亡。古者圣王无流连之游,荒亡之行。”

公曰:“善。”命吏计公掌之粟,藉长幼贫氓之数。吏所委发廩出粟,以予贫民者三千钟。公所身见癯老者七十人,振赡之,然后归也。(《内篇·问下》第一章)

这段文字在《孟子·梁惠王下》之四也有大体一致的记载。^①且据于省吾先生考证:“焦循谓之朐即转附,朝舞即成山。于钦《齐乘》谓:召石山在文登之东。朝、召古通,舞、石声近。”^②可以证明它大体来自于古史。这类记载在《晏子春秋》中大约有102章,约占全部内容的47%。而在记录形式上,记言占90章,记事占12章。从分布来看,《内篇·问》中最多,约占全部60章中的55章;而在《内篇·谏》和《内篇·杂》中,分别占50章中18章和60章中22章,都达到了相关篇内容的三分之一以上比例。相比来看,这部分内容在《外篇》中最少:《外篇第七》27章仅占4章;《外篇第八》18章仅占3章。

《晏子春秋》中还有一部分材料,则明显地体现出源自于民间传说,经过后人不断加工改造的痕迹,表现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夸张和虚构的特点,其笔下的正面人物往往道德高尚,才能超绝;而作为其陪衬的人物,则往往举止夸张,形象滑稽。且由于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经过不同人流传的原

① 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上册,第33页。

② 见于省吾《双剑謄群经新证 双剑謄诸子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下一255页上。

因,同一故事往往衍生出或情节类似而主人公不同,或主人公相同而情节略异的故事串。这部分记载往往寄托了人们的情感和愿望,而表现手法则简单、夸张,如: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阳,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叹,泣数行而下,曰:“寡人将去此堂堂国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细人也,犹将难死,而况公乎!弃是国也而死,其孰可为乎!”晏子独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乐哉,今日之饮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独大笑,何也?”晏子对曰:“今日见怯君一,谀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谓谀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后世贤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国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为可悲?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谀也。怯谀聚居,是故笑之。”

公惭而更辞曰:“我非为去国而死哀也。寡人闻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国君当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国,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义回邪,无德于国。穿池沼,则欲其深以广也;为台榭,则欲其高且大也;赋敛如桷夺,诛僇如仇雠。自是观之,萑又将出。天之变,彗星之出,庸可悲乎?”

于是公惧,乃归,寘池沼,废台榭,薄赋敛,缓刑罚,三十七日而彗星亡。(《外篇第七》第二章)

这段文字又见于《内篇·谏上》第十七、十八章的相近记载,表现形式同样夸张。景公饮酒悲痛,“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而晏子却“独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斥责“怯君谀臣”。当景公“惭而更辞”谈彗星,晏子又不留一点情面地斥责他“行义回邪,无德于国”,并诅咒“萑又将出”。这哪里是臣对君的表现?简直是父亲对顽劣儿子的训斥,明显地体现出材料来自于民间传说的特点。这类记载在《晏子春秋》中大约有 99 章,约占全部内容的 46%;其中记言 60 章,记事 39 章。从分布来看,《外篇》中最多:《外篇第七》占全部 27 章中 21 章;《外篇第八》占全部 18 章中 15 章。而在《内篇·杂》和《内篇·谏》中所占比例也很大:《内篇·杂》占 60 章中 36 章;《内篇·谏》占 50 章中 25 章。《内篇·问》中数量最少,仅有 2 章。

《晏子春秋》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在故事或者人物言谈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理念,它应该是著作的编订者在编订著作时加

人的,是借晏子之口或事迹抒发作者的思想,如:

景公燕赏于国内,万钟者三,千钟者五;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公不说。

晏子见,公谓晏子曰:“寡人闻君国者,爱人则能利之,恶人则能疏之。今寡人爱人不能利,恶人不能疏,失君道矣。”

晏子曰:“婴闻之: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臣从谓之逆。今君赏谗谀之民,而令吏必从,则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爱,以劝善也;其立恶,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兴也,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故明所爱而贤良众,明所恶而邪僻灭,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简易,身安逸乐,顺于己者爱之,逆于己者恶之。故明所爱而邪僻繁,明所恶而贤良灭,离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圣王之兴,而下不观情君之衰,臣惧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争,以覆社稷,危宗庙。”

公曰:“寡人不知也,请从士师之策。”

国内之禄,所收者三也。(《内篇·谏上》第七章)

这段文字内容不可尽信:景公令赏赐,“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但我们明显能感受到:作者在通过这段故事,表达君王正确的立爱、立恶标准和正常的君臣关系的理念。这类内容在《晏子春秋》中占的比重最小,《外篇第八》中没有;《外篇第七》中2章;《内篇·杂》中2章;《内篇·问》中3章;《内篇·谏》中7章。在《晏子春秋》中共14章,约占全部内容的7%。

当然,以上分析、统计也只是根据《晏子春秋》材料呈现的具体情况做出的大体、相对的判断。事实上,《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时代,而其所记却是春秋时期的人物,由于时间相距较久,后人要为前人作出一部全面反映其生平事迹、体现其历史地位的书,其材料来源必然会多方面、复杂的;我们要求其纯洁、单一也是不可能的。另外,各类材料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是错综复杂的,不可能是纯洁单一的。比如,我们根据材料特征判断某些材料可能出自于古史,只是因为这些材料的记载古朴、平实,少夸张、少虚构,体现“史笔”特征,较为可信;但这些材料是不是就一定是“真空”的而没有经过后人的“污染”呢?这也不尽然。事实上,除少数可能直接录自于古齐史的材料,很多材料都是可能经过后人或多或少的加工改造的;只是因为这些材料虽经一些局部加工改造而基本没有改变材料的真实可信的本质,因此我

们就仍然认定其“古史材料”的性质。而很多所谓的出自于“民间传说”的材料,是不是从材料的本源上就一点也没有史实的根据呢?这也未必。但如果这些材料在流传过程中大量注入了人们的爱憎情感和愿望,又通过大量的虚构和夸张而使事件不太令人相信了,我们就基本可以认定此材料偏离了“史”而变成了流传的“故事”。再如,我们说某些材料注入了创作、编订者的思想和理念,既非“纯洁”的史,又非民间传说故事,是不是这些材料就都是创作、编订者的创造?其实也不尽然。应该说其原始材料也可能来自于古史和民间传说,只不过是其中注入了创作、编订者的思想、理念而与其它两类材料略有区别。所以,以上判断只是相对的,并非截然对立。另外,逐章考察《晏子春秋》的行文体例我们也可以发现其材料的差异:《内篇·谏上》记言20章,记事5章;《内篇·谏下》记言20章,记事5章;《内篇·问上、下》60章全部记言;《内篇·杂上》记言18章,记事12章;《内篇·杂下》记言16章,记事14章;《外篇第七》记言16章,记事11章;《外篇第八》记言15章,记事3章。所以,在判断《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前,我们首先必须要对它的内容有全面、透彻的了解;如果不细致地对其每一篇、章内容进行分析,而笼统地将其看成材料来源、记述体例完全一致的著作整体,势必会导致认识上的误差。

以上对《晏子春秋》的材料来源作了分析,对其记述体例也作了一定的考察,那么,该如何认识这部著作的性质呢?笔者认为:它既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传说故事集”,而是一部我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

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小说”,那么它就是作者的一种有意的、以虚构为主要手段的文学创作;而持“小说”论者无法解释,那47%的出自于古史,或者在流传过程中虽略被人们不自觉加工而基本不失历史真实的大量记述怎么就是“创作”?而且,小说是必须要有故事情节的;但《晏子春秋》的记述体例却并不一致,不知“小说”论者如何解释那些仅仅记载君臣间一问一答,基本没有情节可言的材料怎么就是“小说”?持“传说故事集”论者也有类似的问题:“传说故事”既不能涵盖《晏子春秋》的所有材料,其大量的记载君臣间问对的材料也毫无“故事”可言。以上两种观点的问题出在立论者没有对《晏子春秋》全部材料进行统计和细致分析,而仅仅注意到那些出自于民间,带有夸张、虚构特点的部分,因此便认为《晏子春秋》整部著作都是夸张、虚构或者是在史实基础上夸张、虚构的东西,于是便取“历史小说”或“传说故事”来概括整部著作的性质;但这个定性是不全面的,无法

涵盖《晏子春秋》的全部内容。

其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晏子春秋》所记述的材料,人们在最初记录和传播它时目的何在?这也是判断《晏子春秋》著作性质的关键所在。

前文所述的出自于古史的材料是不需要做更多讨论的,其材料最初便可能出自于景公身边的史官或者熟悉、了解晏子的人的记述。人们最初记录、传播它,就是作为历史的可信材料来记述的。其在流传过程中,一部分是被记录在齐史上的,《晏子春秋》的作者从史书上抄录下来,因此它完全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另一部分虽然经过了民间的长期流传,但也基本保持了大体的真实而未做大的改变,所以,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保持了基本真实的可信的史的材料。因此,从史书的角度看,出自于古史的材料无论从记述动机还是从材料所呈现的最终状貌看都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重点来讨论那些出自于民间,有明显夸张、虚构特点的材料。这部分材料是否就是作者在有意创作“小说”,或者在进行文学创作呢?我想,答案也是否定的。作为春秋末期长期执政的名相,晏婴在齐国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人民出于景仰和爱戴,自然要在传播他事迹的时候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理想、愿望,并赋予他众多的美德和才能,因此,便使得关于晏子的流传材料越来越偏离“正史”的本初状貌而呈现出理想和夸张的特点;但我们剔除这些反映人民理想、愿望的成分,其材料的基本部分应该还是可信的,我们又怎么可以因为材料被人们罩上一层理想的薄纱而就将基本的事实也一同否定呢?

我们可以参看一下先秦的其它史书,是否先秦史书就一定排斥虚构和夸张呢?《左传》向来被视为史书,我们看以下这段记载:

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麇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左传·宣公二年》^①)

鉏麇是晋灵公派去刺杀赵盾的刺客,他有感于赵盾的尽忠职守而不忍下手;又感到有负君命,于是触槐而死。那么,一个并无旁观者的自杀之人在临死之前的心理活动作者是如何掌握的?这段心理活动的记载便应该由

^① 顾宝田、陈福林《左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327页。